

安谅的短篇小说集《出镜》已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在该作中延续了一贯轻盈淡然的写作风格,将读者带入他笔下那个虚实交错的世界。

生活是有层次的,对于“身兼多职”的安谅来说尤其如此。作为管理人员的安谅活跃在工作中,作为摄影师的安谅行走在大地上,作为诗人和作家的安谅用笔构建另一个世界。《出镜》中的世界不属于真世界,亦不属于梦世界,在两者之间徜徉,观两处景色,听两处絮语,嗅两处气息,抚摸两处大地。真世界清晰、坚硬,像一张理性而真实的相片,无数条规则在其中经纬交错,一寸寸编织出整体,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刻画出细节;梦世界朦胧、柔软,像印象派的画、充满隐喻的诗,无数意象悬浮其中,碰撞、破碎、融合,没有细节或者处处都是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整体都只是一个细节。

安谅对作品如何反映现实,如何高于现实,显然有过一番考量。他吸收真世界的真实、理性,对于每一个细节不疏忽,撇去过于琐碎的生活浮沫,滤去阴暗肮脏的罪的沉渣,留下真的浓缩的精华;糅合梦世界的高于真实的美和没有边际的想象,整理杂乱无章的思绪,斩断伸张太远的狂想的触手,守护梦的自由的天空。他像一个拥有敏锐味觉的高明的厨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各种调料的分量。在《出镜》中,安谅对于现实的加工修饰,多一分则偏于矫饰,少一分则略欠风味,表现出对剂量相当的掌控能力。

安谅始终是清醒的。《出镜》有意地探索真与梦之间的无人地带。在这片私人花园并非单纯的真与梦的交叉地带,他有意选取了能够开出最美、最富哲理性的花朵的健康种子,播撒在自己的土地。比如,《距离》这篇小说描写了在短短十分钟内发生的事:众人来到赛里木湖边拍摄天鹅,导游嘱咐不要靠天鹅太近,但大家不以为然。明人见状再次提醒,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过近的距离给天鹅造成了压迫感,它们飞掠而去,与此同时明人也感觉到了自己与众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

这是一个“可能真实、可能梦幻”的故事,故事中的天鹅与众人可能存在于现实中,也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中,明人则是现实存在的安谅与安谅精神中的自我在纸上的结合,是和“天鹅”“众人”一样处于真与梦、虚与实之间的人物。

安谅笔下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单纯对现实事件的再现。在《距离》一文中,“导游”“天鹅”“众人”和“明人”都另有隐喻。在某种语境下,可以这样来解读:“导游”象征着维持世界正常运转的规则,虽然存在,却约束力不足;“天鹅”象征着某种脆弱的美,暴露在恶的威胁下;“众人”象征着隐含强大力量和惯性的无知的恶,向往着美却又不由自主破坏着美;“明人”代表着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的柔弱的理智之声,鄙夷着凡俗的恶却又无能为力。被破坏的规则,被亵渎的美,被无知怂恿的恶,被掩盖的理智……这一切共同形成了纷繁的世界,让世界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让美因脆弱和转瞬即逝而更加珍贵。

好的文字是有个性的。精简凝练的文字是安谅作品的标签,仍以《距离》一文为例,这样一篇充满隐喻,能够从诸多角度来解读的小说,作家仅用九百字就完成了。在小说中留白,为读者的想象和解读保留空间,正是安谅的写作智慧。

蕴含丰富的作品,想要用一篇文章来完整解读是一种奢望。相信不同读者能够从《出镜》一书中得到独一无二的感悟,也相信包括本书的安谅《明人日记》系列丛书能在文学之湖中激起一片涟漪。



时代的“风眼”埋伏在人性的对决上

◆ 来颖燕

在写了四十余年小说之后,孙颤终于将取景器投向了他毕生从事的编辑出版领域。回望来路,他的写作谱系里,并不缺他熟悉的人和事,比如知青生活,比如知识分子。但唯独这个沉溺最久、最深的界域,他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是因为近乡情怯吗?用他在后记里的话来说,是因为珍惜。

孙颤是一位堪为思想者的小说家。小说于他而言,是安放他所思所想的容器——他用小说来为思想赋形,用思想来丰富小说的质地,可以想见,在孙颤长达数十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会在思想上经历多少次的辗转反侧。然而,真的要静下心来,表达出这份“辗转反侧”,却是难上加难。因爱而生忧,孙颤热爱出版事业,注定要为出版业殚精竭虑。但这似乎已是他的常态。要如何表现出他曾面临的变数和风云,在平淡中见出深意,本身足以让人“辗转反侧”。当这本《风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知道他终于“亮剑”——他要通过出版人在特殊时期的风口浪尖上所经历的故事,来浓缩和承载这一切的难以言尽。

艾略特曾说,象征是思想的客观对应物。“风眼”本义即为大风暴中看似平静稳定的地带,孙颤在此对其丰盈的隐喻意蕴运用得恰如其分——出版界看起来是风平浪静、远离是非的属于知识分子们的净土,实则却常常会先觉而隐性地反映出社会的局势和走向。平静的周围遍布着激变的风云,风暴一触即发:改革开放前夕,上海的一家大型出版社的编辑嗅觉灵敏,策划了一套市场经济的丛书。没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丛书热卖,但也受到了上级的质疑和批评。在丛书选题经历严峻考验的同时,出版社上下——从社长、

副总直到责任编辑的内心更经历着惊涛骇浪般的挣扎和拷问。时代的激变,刻画出了出版界的众生相,他们或坚守、或退缩;或砥砺前行,或恐慌自保。最终这一选择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归向了一个由出版社策划的研讨会……

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静与动、守与变,在小说中被不断并置。这样的并置造成的张力,使得小说中的具体故事及其象征意义同时生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走在当下的轨道上,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但当我们回望,当我们不再以结果论断是非时,会惊觉原来前人曾经面临过那么多的岔口。而如果当初走上了的是另一条岔道呢?

孙颤以其高明的智慧,还原着当时的情境,也点醒着人们,该当如何重新去看待来时路。小说虽是以孙颤一贯的现实主义笔法娓娓道来,却保持着得当的节奏,在一些关键之处留白,之后以蒙太奇的手法切换到另一时空。最典型的是关于那场至关重要的研讨会,他只写到会议前唐社长和郭副总一众人等的复杂心理,于研讨会的过程和结果却是一并略去,继而直接将镜头切到“几年后”。当然,几年后的情势早已经让那场研讨会的结果不言自明。但这样的戛然而止和跳跃,正以一种更开阔的架构,晕染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让人对特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感同身受。小说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作者看似隐身,实则无处不在——他自始至终的旁观者身份,以一种冷静而广泛的作用力分布在整部小说之中,让读者在沉入故事的同时不断地陷入自发性的思考——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记忆的根须会慢慢延展,而未经的则愈加要在小说中人的视野中重新考量历史的进程。

孙颤多思善思,却并不迷信“大写”的思想,所以他的小说显得真实、坦率、朴素。他的

作品虽是题材各异,浓重的笔墨和最终的基点却常常落在对于人性的揭露和考量上。《风眼》更是如此。在出版界多年的沉潜中,他深谙在一些“非常”时刻和事件面前,人性最能显形。于是,他构思了这样一部“戏”,将小说人物置于动态的社会语境中。唐社长对于出版事业的呕心沥血和对年轻后辈的真诚提携、秦副总的聪明反被聪明误、郭副总的书呆子气和正气,乃至年轻美丽的女编辑牛鹭鹭的少女心事……纳博科夫曾在他的《文学讲稿》中说道:“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上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集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这段话如此巧合地道出了《风眼》的成形过程——面对最亲近和熟悉的出版事业,孙颤有着太多的现实经历,但他不会直白地记录,而必定要用自己的思考和命题重新将这些现实熔化、组合。而他所有的思考都不会只是附着于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或是社会问题上,因为小说,说到底,关注的是“普通人”。这所谓的“普通人”要依靠作者所展现的特殊人群来体现和引发共鸣。前提是,作品的地基是对于“人性”一词的定义,这是小说之所以会吸引人的终极原因。时代的“风眼”埋伏在人性的对决上——孙颤就此成功地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过去的研究,往往是源于对于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质问。《风眼》看似聚焦于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事件,根底上却是直面更普遍也更本质的人性之争。这让小说承受着双重的被拷问的压力,但《风眼》通过细致又大气的引人和退出,经受住了这些压力,引得人沉默内省,又教人读得荡气回肠。

艺术,照见现实的冷峻

◆ 刘蔚

塞尔吉是一位皮肤科大夫,他花20万法郎买了一幅现代派画家安特里奥斯的油画。这幅画长约一米六,宽一米二,白底色,如果眯起眼睛细看,会发现还有细细的白色条子对角线。然而,塞尔吉的好友马克对这幅油画嗤之以鼻,两人之间为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把另一位好友伊万也卷了进来。三人的友谊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就是法国剧作家、小说家、演员雅丝米娜·雷札的剧本《“艺术”》的大致剧情。《“艺术”》与雷札的另一个剧本《杀戮之神》为她带来世界性的声誉。

该剧的剧名本身就颇耐人寻味。作家给“艺术”打了引号,似乎在强调某些东西。艺术的功能是什么?艺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就欣赏的主体而言,艺术是具有审美愉悦的文艺作品。但果真如此吗?马克不满塞尔吉摆阔,花20万法郎却买了一幅“白画”,他嘲笑塞尔吉由此变成了“艺术收藏大家”。伊万则认为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没什么。马克却回答,这幅画已经伤害到了别人,因为他的好朋友由于赶时髦而上当受骗,丧失了最起码的鉴别力。塞尔吉自然对马克毫不留情的讽刺挖苦感到目瞪口呆,更不满马

克批判时的自以为是、毫无人情味。伊万个性随和,他本来想在两个朋友之间作些调解,不料却招致两人的不满。马克攻击伊万毫无主见;塞尔吉则嘲笑伊万“不要老是想和稀泥”。伊万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变成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显然,“艺术”并没有给三个好朋友带来审美的愉悦,反而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求同存异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然而,知易行难。现实生活往往比理想灰暗冷峻得多。马克与塞尔吉爆发冲突,说到底,还是因为双方对艺术之“道”发生了原则分歧。马克讨厌那种标新立异的艺术法则,认为那些哗众取宠的“艺术”就是皇帝的新装;塞尔吉则认为马克的思想僵化。英国著名艺术史评论家西蒙·沙玛在《艺术的力量》一书中这样阐述:“艺术的使命,不仅限于传递美,更是要破坏陈腐与乏味。”就艺术具有突破创新的功能这一点而言,塞尔吉的理念无疑是前卫的。

对艺术之“道”的不同理解让三个好朋友大吵一架,加之不同个性的碰撞——马克尖刻严苛、塞尔吉自信清高、伊万随遇而安,使



得三人间的友谊纽带顷刻间变得脆弱,趋于崩溃。更令人吃惊的是,从对一幅现代派绘画引起的争执,接着演变成了对彼此私生活的攻击。伊万在工作上并不顺心,并在为婚礼而烦恼。马克非但不安慰他,反而让伊万干脆取消婚礼,并嘲笑他只知道讨好别人,奴颜婢膝。塞尔吉反戈一击,讽刺马克的女友鲍拉驱赶烟雾的样子“恰恰就是她本性粗鄙的集中体现”,让马克怒不可遏。由艺术之“道”的争执,竟然演变成了家长里短的揭丑,琐碎不堪,一地鸡毛。

剧本的结尾,三个朋友都冷静了下来。伊万不想成为一个权威、一个榜样,只想做能让塞尔吉和马克快乐的好朋友。塞尔吉意识到,他在乎朋友其实超过那幅“白画”。马克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他看重友谊,所以容不得朋友在收藏艺术品的行为上丢份降格。三人去饭店里吃了饭,准备重建被他们的言行毁坏了的友谊。

由一幅“白画”引发的风波,倒是可以触发我们更多的思索。艺术究竟是什么?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还是毕加索说得好:“艺术是一个谎言,它令你认识真实。”艺术,可以照见人性的美好或丑陋,光明或阴暗。这,也许正是艺术的力量所在。

新书速递

**《春风十里》:石钟山回归军旅
题材全新长篇小说**

《春风十里》是著名编剧、军旅作家石钟山全新军旅背景长篇小说。农家子弟李满全,在即将退伍的日子里,面对返乡的命运,初恋的背弃,左右为难时,

**《炎夏》:巨变之际何去何从,
神秘书楼解生命之惑**

明治三十年代,弥合与革新之际,世人惆怅,文人争鸣。东京郊外,一间名为“吊堂”的神秘书店,堆着浩如烟海的古今东西各类书籍。吊堂主人是一个不

明来历、绝尘拔俗的书痴。出身富裕士族的塔子,受家人逼婚,逃至郊外,偶入隐于世外的书楼吊堂,遇到身份不凡的神秘探书者同时造访吊堂。

洞若观火的吊堂主人,为心有迷惑的探书之人寻得指引各自方向的生命之书。本书“随着虚实交融的笔法,一窥

事辗转,人聚人散,李满全该何去何从?这是石钟山睽违10年回归军旅背景小说的力作,巧妙地将小人物的命运放置到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人物塑造个性鲜明,故事情节高潮迭起,语言结构独具特色,接续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脉络基因,将文学性和大众性完美结合。

作者京极夏彦,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1994年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姑获鸟之夏》,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曾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等。

